

战略分歧与日韩关系困局*

□ 吴怀中

（提 要） 近年来，日韩关系持续紧张，两国间历史纠葛、领土争端、经贸摩擦等日渐加剧，“战略分歧”所起深层规范作用愈益明显。日韩战略分歧是由双方围绕结构性要素的矛盾而生成并加剧的，其作为新的基础变量从深层结构影响着日韩关系的发展走向，具体表现为对朝路线造成双方基本的安全政策分歧，两国围绕中国崛起在地缘战略上不断形成分歧，而“特朗普冲击”下的同盟管理导致两国分歧不断加重。由于内外因素作用，日韩逐步走向战术性缓和是大概率事件，但两国关系要真正实现结构性的改善与升级，则需要通过调整战略参数、重建政治共识等来消解战略分歧，这一进程势必曲折而艰难。

（关键词） 日韩关系、朝鲜问题、中国崛起、同盟治理

（作者简介）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3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20）5期 0077-17

当前，日韩关系虽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迹象，但仍处于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借助近年中日韩三方平台互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互助之需，日韩关系被认为有望加速得到解冻、回暖，然而现实却是双方仍在僵持、对峙而不愿言和、走近，以至于进入2020年春夏后再次发生令人愕然的争执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AGJ009）的阶段成果。

与摩擦。对于日韩关系紧张，国际关系及区域问题学者一般将历史对立与认同差异、围绕领土及经贸等的现实利益冲突这两大主客观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1]然而，这些变量只能解释事态的一部分，它们并非两国关系中所有重要的因果要素，在复杂的国际变局与地缘形势下，这些矛盾与摩擦也往往是结果而非动因。不可忽视的是，日韩关系的对立构图与因果逻辑正发生某些重要的深层变化，战略分歧正在使日韩关系迟迟难以摆脱困局并走向正常化，更不用说顺利步入曾被乐观预测的“准联盟”状态。战略分歧是围绕国家间关系的关键性结构要素（如安全政策、地缘构思、同盟治理等）的战略层级矛盾而造成并加剧的。就日韩关系而言，抽象的文化与认同差异、具体的现实利益冲突，可以刺激但没有生成结构性的战略分歧。日韩关系的核心及深层部分出现裂隙，不但使当下两国的困难局面错综复杂，也使将来的双方关系走向面临变数。

一、“朝鲜因素”造成日韩基本安全政策分歧

至少在表面上，朝鲜在日韩安全政策与话语体系中扮演着结构性因素的角色，对朝政策也直接影响着日韩的安全合作走向。日韩对待朝核问题的温度差——尤其是韩国进步派和日本保守派执政时的政策差异，往往引发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与互疑。两国在有关威胁性质认知和有效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朝鲜因素虽都被双方视为制定安全战略之时的重要理由，但日韩的任何一方以此为由大幅改变安全战略也可能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这就增加了对彼此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感以及相互疑虑。情势恶劣时，两国甚至有时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围绕朝核问题的另一种潜在安全风险因素，这种相互分歧与双向互疑给双边关系造成了某种规范和基调，并导致各层级的持续误解。

（一）日韩对“朝鲜威胁”的认知差异

自21世纪初日韩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开启会晤后，两国对“朝鲜威胁”

[1] 知网(CNKI)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后的20年里，研究日韩关系的学术论文或时评文章近百篇，但基本以论述日韩历史纠葛、现实利益合作或冲突（包括岛屿争端、经贸摩擦）为主，未见专门以“战略分歧”或“战略性的结构矛盾”为主题或主要切入点撰写的论文。

性质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对策在不断反复变化。小泉纯一郎与金大中分别于2000年6月、2002年9月访问朝鲜，这也是两人作为日韩领导人首次访问朝鲜，这些访问导致进入21世纪后朝鲜在两国国内的形象发生了重要转变。2000年的韩朝峰会让许多韩国人相信，南北之间应该有对话和谈判的政治空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绪由此生成、高涨并延续至今。^[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朝峰会披露出的日本人绑架事件，强化了日本公众对朝鲜的负面印象。从那以来，朝鲜在日本的形象一直是负面阴暗的，无论是民主党组阁还是自民党组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试探总是在缺乏灵活性中草草收场。朝鲜及“绑架问题”是日本最敏感和政治化的外交政策议题，任何一位首相都不大容易力推日朝关系正常化。

随着对朝认知的不断转变，日韩对各自传统安全原则也在持续进行重新评估，两国公共政策辩论的基调越来越倾向于质疑有关“朝鲜威胁”的本质和核心假设，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种种影响。例如，“朝鲜认知”的大幅更新使得首尔考虑替代性安全战略选择的余地和合法性得以扩大，但在日本，即使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期末尾以及2018年美朝举行历史性首脑会晤后，调整对朝政策仍然难以得到新的“合法性”背书。这暴露出日韩在如何看待“朝鲜威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冷战时期，日韩的安全政策指向受到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的支配，双方的社会观念也相对稳定、趋同。冷战结束后尤其近10年左右，两国的对朝认知差异和政策调整错步，是导致双方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关系不断震荡和复杂化的根源之一。简而言之，两国都不确定对方相关战略调整的指向与终点究竟落在何处。因而，日韩相互猜测对方意图和能力的趋势日益明显，对对方未来安全轨迹也变得越来越敏感。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两国尤其对地区新安全环境的看法越来越不同。2019年1月，文在寅政府发布的首份《国防白皮书》删除了“北朝鲜是敌人”的语句，对朝鲜作战之际假定使用的“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KMPR）的措辞也消失了。^[2]可见，朝

[1] 「朝鮮半島問題の地政学的分析と我が国の対応」、世界平和研究所、2003年3月、<http://www.iips.org/research/data/bp296j.pdf>。（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韓国国防白書、「北朝鮮は敵」外して」、『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9年1月16日。

鲜核武计划并没有完全压制住一种底流，即韩国人仍然认为朝韩统一是可取的并也是可行的。所以，在日韩两国的战略话语体系中，一种常见的相互分歧与猜疑是，对方正以变化的朝鲜因素为借口，有意削弱原有的共识性安全原则和机制，而这些曾为日韩维持昔日良好双边关系提供了基础。^[1]

（二）韩国对日本涉朝安全政策的疑虑

总体上，韩国人通常认为日本在处理半岛问题时没有资格采取直接的强硬措施，日方若采取强硬外交立场或发表挑衅性声明，都会被认作日本正在转向“右倾”或者无意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充分道歉。进入新世纪后，韩国媒体不时主张，日本修订其和平主义安保法制时使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朝鲜绑架日本公民事件——利用公众的“受害者心态”及受害国家身份和认同，使日本不仅能对朝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从长远来看还能对地区安全采取更强硬武断的措施。

例如，2002年小泉首相访问平壤后，日本政府对朝鲜日益强硬的态度，在绑架问题上的“过度关注”和对侵略历史的相对忽视，引起了韩国媒体的强烈关注——多指责日方夸大绑架问题和其他与朝鲜有关的案件，以使其真正隐藏的“再军事化”野心合法化。日本对朝强硬姿态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利用社会情绪和公众压力，为实现隐蔽议程而祭出“借口清单”。当时韩日两国相关调查统计显示，60%以上的受访者对日本扩大安全角色持负面看法。韩日都较为一致地认为，朝鲜半岛确实是大国博弈和地缘争斗的“通道”，然而，两国强调这一“历史教训”的立场和心情却是相反的，韩国人认为日本一直在利用地缘政治的借口觊觎朝鲜半岛，妄图将其作为实现势力扩张和大陆野心的跳板。^[2]

其后，韩国历届政府多少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和警惕感。例如，在2004

[1] DongJoon Park,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helve GSOMIA," September 19,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the-us-japan-and-south-korea-should-shelve-gsomia-for-now/>.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武貞秀士「韓国の脅威認識の変化と軍近代化の方向」、『防衛研究所紀要』第6卷第1号（2003年9月）、38-50頁。

年7月日韩峰会上，卢武铉敦促日本“理性”和“客观”地对待朝鲜。^[1]2006年7月，朝鲜发射大浦洞-2导弹后，日本单方面对朝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而韩国总统办公室（青瓦台）则表示：没有权威断定在该地区需要进入紧急状态，因为这些导弹没有瞄准特定国家，没有理由过分关心这个被打破平静的黎明，就像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2]当一些日本官员敦促其政府考虑将针对发射基地的先发制人打击作为未来政策选项时，青瓦台则发表声明称：这揭示了日本意图重新武装的性质，我们对此强烈警惕，这些威胁性的语句将危及东北亚和平。^[3]

至今，怀疑日本在利用朝鲜作为“再军事化”借口的言论在韩国仍不时出现，并不太可能于短期内消失。与此相关，日本整军强兵、推进修宪等动向，在韩方看来是日本欲再次“展示肌肉”的战略野心的体现。“安倍依靠民族主义政治基础以及努力消除和平宪法限制，使日本恢复‘正常化’大国地位，这也使日韩关系变得复杂。”^[4]对于日本2003—2004年间通过“有事法制”、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近年发展攻击敌方基地能力以及打造“多维联合防卫力量”等动向，韩国都鲜明地发表了警惕和疑虑之声。^[5]

（三）日本对韩国涉朝安全政策的疑虑

在日本，保守派媒体及主流精英层往往批评并担心：日韩同属关键的“民主阵营”，但韩国易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视朝鲜为潜在的统一伙伴而非直接威胁，“泛朝鲜民族主义”可能会通过进步派政府导致韩国改变对冷战盟友日本的立场，韩国对朝软弱且友好的姿态会导致日美韩合作削弱以

[1] 山本健太郎「国交正常化から50年の日韓関係」、『レファレンス』2015年5月号、56頁。

[2] 船橋洋一『ザ・ペニンシユラ・クエスチョン—朝鮮半島第二次核危機』、朝日新聞社、2006年、465-466頁。

[3] 同上、466頁。

[4] Frank Jannuzi, “Out of Tune: Japan-ROK Tension and U.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October 9, 2019,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out-of-tune-japan-rok-tension-and-u-s-interests-in-northeast-asia/>.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5] 「70年ぶり戦争ができる日本に」、『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5年9月19日；「日本、先制攻撃できる国野心」、『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7年3月30日。

及区域环境恶化，这可能给日本带来负面的安全影响。^[1]

在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进步派执政时期，日本的这种担忧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卢武铉曾承诺将延续“阳光政策”的精神，一度公开反对美国提出的在韩重新部署美军基地的要求，而这是布什政府军事转型计划的一部分，也涉及驻日美军整编。对此，日本主要媒体在评论有关卢武铉的对朝“囿和政策”及其对美日韩关系的潜在影响时，表露了显而易见的焦虑和不满。不仅如此，日本决策层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担心过如下三种类型的典型事态：第一，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在处理朝鲜核导危机的最佳方式上与日本存在严重分歧；第二，卢武铉宣布韩国将在该地区包括在中美日关系中扮演更中立的“平衡者”，而朴槿惠和文在寅则无意参与日本的对华“价值观外交”及地缘政治包围；第三，卢武铉、文在寅等容易受到朝鲜非常有效的影响，日韩围绕美朝会谈及韩美朝互动也有不同目标。在日本，以上这些被认为是韩国为了寻求国家利益而造成对日不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也为日韩关系面临更多困难埋下了伏笔。^[2]

安倍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对文在寅的疑虑和不信任由于重大事件的连续发生而达到了一个顶点。美国东亚问题专家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指出，日韩“危机符合一种可预见的模式，即一个进步的政府往往对朝鲜更温和，对日美更敏感”。^[3]日方观察人士的看法则更直接而激昂：文在寅政权下，南北朝鲜的和解、同族论日益高涨，政权中枢的“反日反美民族主义”观根深蒂固。^[4]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的见解可谓显示了“军方”的一种观点：“同文同种的南北朝鲜走向统一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但像文在寅政权这样接近北朝鲜的政权，过去没有过。对日本来说最坏的前景就是北朝鲜主导完成统一，出现了反日的拥核国家。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将大幅改

[1] Murata Koji,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s,” July 12, 2006, http://www.esuj.gr.jp/jitow/205_index_detail.php.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木村幹「日韓關係修復が難しい本当の理由」、2013年12月20日、<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2701/>。(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3] DongJoon Park,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helve GSOMIA”.

[4] 黒田勝弘「韓国の「旭日旗」批判は歪んだ対日戦勝史観の産物だ」、『SAPIO』2018年11・12月号、35頁。

变防卫战略。”^[1]而韩国国内的保守派及部分精英亦认为，文在寅“亲北疏美”，低估朝鲜构成的威胁，将与朝鲜交往优先于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和经济联系。“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与平壤恢复友好关系，就朝鲜问题而言，韩国与中国的作法更为一致。”^[2]

2018年12月，韩朝为落实之前的首脑会谈协议而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举行了南北道路连接工程开工仪式，日本保守派评论家就此指出，在美国加强对朝制裁的情况下，韩国向本应强烈敌对的军事独裁国家俯身谋求和解的同时，不知为何却对自由主义阵营的友邦日本采取了敌对高压姿态。^[3]2019年9月，文在寅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对金正恩委员长致力于无核化进行了积极评价，表示已到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新决心和努力积极响应的时候。对此，日本主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指出：文在寅演讲的异常之处是其基调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的精神，其讲话透露出韩朝统一后“假想敌国”不可能是中国或俄罗斯，只有日本。^[4]

二、日韩围绕“中国崛起”加深地缘战略分歧

解析日韩关系，地缘政治因素不容忽视。对海陆权重、大国竞争等不同的安全考量导致了日韩战略重点的分化。中国崛起给日韩都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冲击，但造成的效果却有微妙差别。总体上，韩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度、搭车热情要高于日本，其作为半岛国家不乏在海陆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需要——虽然也经常为此面临困扰和矛盾。日本自我定位为“海洋大国”，“联海制陆”的战略取向明显，对韩国的“事大主义”及“亲中向陆”不免抱有疑虑和警惕。近10年来，日本的涉华地缘战略及“价值观外交”中很难觅见

[1] 河野克俊·村田晃嗣「専守防衛を再考せよ」、『Voice』2019年12月号、46頁。

[2] Jae Ho-Chung, “South Korea’s US-China Conundrum,”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castasiaforum.org/2019/10/10/south-koreas-us-china-conundrum/>.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3] 潮匡人「レーダー照射、韓国に道理を説いても無駄である」、2018年12月29日、<https://ironna.jp/article/11559>.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4] 大前研一「トランプと文在寅はとんでもない大統領だ」、『週刊ポスト』2018年11月30日号、61頁。

韩国的位置和角色，而韩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大胆举动往往会引起日本保守势力的忧虑和批评。两国在涉华地缘战略方面难以对接与合作的矛盾，时有发生并不时加重。

（一）日本的涉华战略与日韩矛盾

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历史经验仍然主导或影响着日本部分保守派的战略思维样式。日本长期以来对朝鲜半岛的理解根植于明治时代的地缘政治战略，认为其是“指向日本的匕首”，是中国等大陆势力投射力量的历史通道。这种理解仍然广泛存在于与安全相关的叙事体系中。^[1] 日本认为，近年来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发生剧变即东亚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重新崛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上日本比韩国强大许多，但现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扁平状态，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高，相对而言日本的重要性下降了很多。”“韩国外交最近看起来发生了轻视日本、重视中国的变化”，这背后应具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理由。^[2]

由于日韩关系恶化、中国崛起、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东亚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安倍政府的外交基本方针，就是以东亚安全环境的稳定为目的而形成对华包围网，安倍首相自身肯定也是将中国认定为最需警戒的对手”，“朝鲜半岛自古以来较之日本更深受中国的影响”，“抑制中国的大国扩张需要将美国、韩国拉入其中”。^[3] 然而，事与愿违，当今日本战略界及安全政策界总是难免担忧：随着中国崛起并逐渐恢复区域主导地位，韩国可能会与大陆邻国“结盟”或倒向大陆怀抱，抛弃与美国的传统联盟结构，在地缘政治上转而反对日本，从而成为日本安全的负担。日本“厌韩”派势力批评韩国时经常使用的话语就是“事大主义”，始终担心韩国重回历史上的“亲中事大主义”：“韩国正站在历史的分歧点——是与日美一起作为海洋国家生存下去，还是与中国携手作为南北统一的大陆国家存在下去？现状

[1] Recharad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

[2] 宫家邦彦「半島国家の悲しき世界観」、『Voice』2014年11月号、76頁。

[3] 井上寿一「歴史の忘却が東アジアを救う」、『Voice』2019年12月号、58頁。

是文在寅政权可能选择后者。”^[1]类似的担忧较多体现于思想保守的政治家、媒体、学者和公共政策精英的安全叙事，而他们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提出，日本将不得不考虑驻韩美军缩减及撤军危机的现实性，主张复活美国在朝鲜战争前夜在日本和半岛之间所划的“艾奇逊防线”，日本的防卫必须扩大到五岛列岛和对马岛，包括考虑对朝鲜半岛的防卫。^[2]

与怀疑韩国“亲中事大主义”一体两面的，是日本的“蔑视韩国”观。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国家很难自主决定事情，即使向半岛投入资源，其回报也非常令人担忧；半岛总是夹在中俄日等强国之间，奉行“事大主义”并随时改变立场，对半岛抱有过高期待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据大国力量的增减而不断改变立场是半岛国家的宿命，应该抓住与美中俄这些地区大国的关系，日本外交中的韩国比重相对较小才符合国家利益。^[3]应该说，当日韩关系处于二战后最低点的时候，这种声音和观点在日本战略界和政策界并不少见。

实际上，日本一系列重大的涉华外交与安全战略构想，也都是绕开韩国设计和推进的。这既是因为韩国不愿意参与公开牵制和明显包围中国的美日战略，也有日本方面判定韩国“靠不住”和“分量不够”的原因。从“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到日本版“印太战略”甚至再到 TPP（CPTPP）等诸般构想，其中都难以发现韩国的位置和角色，日本政府近年来基本是将韩国排除在其倡导的区域战略或秩序的合作伙伴之外。从 2015 年开始，日本《外交蓝皮书》分别删除了以往强调的日韩“共享价值与利益”以及“韩国是共享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等表述。非但如此，安倍 2018 年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这一宏大战略性对外构想时，开始急剧恶化的日韩关系却首先成了短板和“拦路虎”。

[1] 河野克俊·村田晃嗣「専守防衛を再考せよ」、『Voice』2019 年 12 月号、45 頁。

[2] 用田和仁「脱韓国～ 対中作戦で米陸軍・海兵隊が陸自と一体化」、2019 年 3 月 12 日、<https://news.goo.ne.jp/article/jbpress/politics/jbpress-5571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

[3] 松川るい「問題は日韓関係ではない、韓国自身である」、2019 年 01 月 5 日、<https://ameblo.jp/matsukawa-rui/entry-12430952173.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

（二）韩国的涉华战略与韩日矛盾

当进步派执政时，例如卢武铉、文在寅时期，韩国在地缘政治以及大国关系处理上更容易与日本发生矛盾，尤其是与日本保守右翼政府产生对立与摩擦。朴正熙、全斗焕、李明博等保守派执政时期，日韩关系显得相对较为顺利但也时有不和谐。例如，卢武铉执政时顶住重重压力，要求收回美军指挥权、推进自主国防，同时作为东亚“平衡者”开展对中美两国的均衡外交，这在当时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和警惕。文在寅作为卢武铉的秘书长，在政策指向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卢武铉的遗志，例如其政府有意保持对海陆方向的平衡和对冲，并曾表示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等。日本媒体和政治家尤其是右翼保守势力，担心这样的趋势会导致未来日美退出半岛而中国恢复对“统一朝鲜”的传统影响力：“最大的悲剧是韩国现政权真的相信，改善对中朝关系可以与日美韩同盟合作并行不悖。”^[1] 亲日的美国学者亦撰文指出：“日本高级官员和决策者越来越相信，韩国进步派政府决心改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文在寅政府将追求与朝鲜统一的梦想，而统一后的朝鲜将在中国主导下转而反对日本”。^[2]

从朴槿惠到文在寅时期，韩国方面一直对安倍的政治倾向与近邻政策持有疑虑和戒备。朴槿惠虽为保守派人士，但日本认定其有意“亲华拒日”，如其在有关东亚历史问题上推行中韩“共斗”、顶着压力出席中国阅兵、推动了中韩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合作等。日本前驻韩大使武藤正敏认为，朴槿惠并不反日，但因为过于重视中国导致轻视和怠慢日本，并且拘泥于“历史问题”，所以日韩关系并不良好。^[3] 2015年，中日韩三国政府领导人会晤时隔3年半再次重启，与李克强总理的正式访韩相比，安倍对韩国则是“工作访问”，没有受到期待中的外交礼遇，这也算是日本与韩国乃至与中韩两国因历史问题造成关系“温差”的一种体现。

[1] 宫家邦彦「近未来の韓国・台湾と日本」、『産経新聞』、2019年7月26日。

[2]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January 14, 2019,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260149>. (上网时间: 2020年8月15日)

[3] 武藤正敏「朝鮮半島情勢と日韓関係」、2016年5月26日、http://www.kiip.or.jp/societystudy/doc/2016/20160526_gaikoureyume_MutooMasatoshi.pdf. (上网时间: 2020年8月15日)

在 2015 年至 2016 年的一年左右时间内，韩国推动或完成了多项让日本难以“放心”的地缘政治及经济重大事务：（1）跟随除美国以外的西方主要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积极支持和参与；（2）在朝韩发生激烈危机后、韩美重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之际，朴槿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并与习近平主席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3）中韩自贸区落地，韩国达成先于日本进入中国的目标。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同期美日主导的 TPP 协议却未将韩国包含在内，这表明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并没有在同一轨道上运行。朴槿惠试图以“模糊”战略使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但在中日之间则明显地采取了具有倾向性的政策。对韩国外交政策这种“向陆漂移”，日本学界和政策界表达了明确的忧虑和批评。虽然因“萨德”入韩事件导致中韩关系出现矛盾摩擦，但日本仍有人认为：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再加上它为追求统一而优先考虑与朝鲜“后台”的关系，使其难以不向大陆靠拢，并且基于这些原因，最近几届韩国政府——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在讨好中国^[1]；2017 年韩国官方发出包括“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等的“三不承诺”，等于站队中国，这可以说是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胁^[2]。

三、美国的同盟管理加重日韩战略分歧

理论上讲，美国霸权及其同盟管理、日美韩三边互动原本是消除日韩战略分歧、加强相互协作的有效方式。^[3] 鉴于日韩双方的互信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如果这两个疏远的邻国想要恢复和谐，那么美国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上，韩日两国对美国的信任超过了对彼此的信任”。^[4] 然而，特朗

[1] Takuya Matsuda, “Geopolitics Redux: Explaining the Japan-Korea Dispu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November 7,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11/geopolitics-redux-explaining-the-japan-korea-dispute-and-its-implications-for-great-power-competition/>. (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

[2] 室谷克实「レーダー照射に驚きと戸惑い」、【zakzak】、2018 年 12 月 27 日。

[3] 李柁：“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78-79 页。

[4] Frank Jannuzi, “Out of Tune: Japan-ROK Tension and U.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普对同盟的轻视及管理失策,使得三边平台运转极为不畅,反而造成韩日两国的裂痕不断加大。例如,围绕朝核问题,近年韩朝、美朝之间展开多轮互动,引人关注,但日美韩“非均衡”的涉朝互动尤其日本被置身于事外,极大地引发了日本不安及其对韩国的疑虑。事实上,外界都已注意到,特朗普在朝鲜及其领导人身上花费的“心事”,远远超过在处理该地区盟国关系上投入的精力。正如美国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所作评论:“日韩关系恶化,美国对此的参与度低下也是重要原因。如果是过去的美国,对自己的同盟国日本和韩国,从早期阶段就介入了。对同盟国的管理能力低下,导致了日美韩关系的结构性变化。”^[1]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车维德(Victor Cha)曾有如下论断:当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显得薄弱时,日韩倾向于搁置分歧并进行合作。^[2]然而,由于新的国际大变局以及地缘政治动态的影响,这一论断似乎正失去历史效力。

(一) 日本被韩美置于“朝核会谈”之外与日韩矛盾

安倍首相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将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要求其实现无核化。日本虽然是六方会谈成员之一,但在朝核问题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朝鲜半岛事务中只是个次要角色,既不是朝核问题直接当事方,手中更缺乏影响半岛局势走向的筹码。因此,“绑架问题”成了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最有利抓手。特别是2018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形势接连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与中、韩、美、俄频繁互动,但日本基本被排除在外,日本舆论对安倍政府应对无方指责不断。在此情况下,安倍更要不停地加大利用绑架问题,以显示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作为。日本一些人希望,安倍能够抓住正确时机,从施压转向对话,并在解决朝鲜无核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安倍显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与安倍的作法相反,文在寅捕捉到金正恩发出的对话信号后迅速行动,并积极充当美朝沟通的“中间人”角色。2018年初,金正恩提议派遣朝鲜

[1] Sheila Smith, “Seoul and Tokyo No Longer on the Same Side,” July 1, 2019, <https://www.cfr.org/blog/seoul-and-tokyo-no-longer-same-side>.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Victor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June 2000, Vol.44(2), pp.261-291.

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仅仅月余，朝鲜高官和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开幕式上即相邻而坐。2018年3月，韩国总统府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在白宫出人意料地宣布美朝将举行峰会。尽管日本官方坚称与美韩保有沟通并有效掌握事态发展，但有证据表明，这些重大动向显然让日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1]同年4月，文在寅组织了韩朝板门店峰会，并为其后的美朝峰会作铺垫。韩朝同年晚些时候又举行了两次峰会，而2018年之前朝韩两国领导人只在2000年和2007年会晤过两次。更引人注目的是，金正恩和特朗普于2018年6月、2019年5月在新加坡和越南分别举行了首脑会晤。2019年7月，特朗普在访问韩国之际，突然跨过“三八线”与金正恩会晤。据日媒报道，安倍对此也是不知详情。^[2]美朝之间的各种互动事实，给了韩国更多转圜余地来维持对朝活动而不必过多顾虑日本的反应。尽管这些活动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日本，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其中，韩朝合作和美朝接触一度形成令日本无比尴尬的演进势头。

其实，在朴槿惠执政后期，韩日2015年达成《慰安妇协议》、2016年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后，双方关系有所好转，2017年也有过较为融洽的合作。2017年全年与半岛有关的不稳安全环境，以及特朗普鲁莽的对朝强硬言论，为日韩提供了很大的合作动力。日韩双方都赞成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情报共享以及与美国举行三边军事演习，安全合作的紧迫需求看似一度抑制了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的历史问题。

日韩新近对朝鲜的战略观点发生重大分歧始于2018年初，文在寅政府通过“冬奥外交”开始对朝缓和关系，而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则基本没有改变。在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接触后，日韩的战略考量很快显现分歧，文在寅接受了开启韩朝和解的挑战，但对安倍来说，日本被绑架者的问题比朝鲜核威胁更重要。这种战略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削弱了日韩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双方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的政治动机。从过程看，

[1] 辰巳由紀「米朝会談と日米「安倍トラ」関係の盲点」、2018年3月24日、<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18/03/post-9810.php>。（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松尾貴史「板門店で米朝首脳会談 安倍総理の「蚊帳の外」感」、『毎日新聞』2019年7月7日。

安倍既没有参与美朝无核化谈判,也没有参与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而仅仅要求特朗普和文在寅代表日本向金正恩提出绑架问题。日本一直试图对朝保持强硬立场,却处于被种种涉朝议程尴尬地排除在外的边缘化境地。安倍政府不得不适当缓和其既有的强硬政策,比如2018年4月发表“外相声明”,表示欢迎文在寅推动无核化进程,然而“韩国政府对日本此类关切感到不屑一顾,不认为日本是朝鲜半岛的参与者,也不觉得有必要缓和对日关系”。^[1]首尔对平壤的举动淹没了东京的存在感,韩朝撇开日本互联互通,既令安倍不快,也使其非常焦虑。

(二) 霸权缺位、同盟失治与日韩分歧加剧

2018年至2019年,日韩之间频繁发生的事件,既是经年互信严重缺失造成的后果,也反过来重又加剧了双方的分歧与互疑。短短一年有余,“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赔偿、韩国国际观舰式旭日旗悬挂、火控雷达照射、出口管制及贸易战、韩国一度宣示废弃《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等重大摩擦事件接踵发生。这些事件大多与安全议题有关,即与战略或政治层面的矛盾有关。例如,关于韩国政府试图废弃GSOMIA,安倍表示将敦促韩国遵守约定,恢复两国互信关系。^[2]即便是贸易争端与出口管制,安倍政府使用的理由也是“安全保障”——声称其限制向韩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决定源于担忧韩国缺乏监管的国家安全体制。^[3]而文在寅政府对此的理解则完全针锋相对:日方此举在于打击韩国未来发展,给韩国的对朝政策制造障碍,动摇韩日安全合作基础。^[4]2019年9月,河野太郎外相针对日韩“强征劳工”赔偿争议发表文章,文中也不忘点出“安全”问题,指出韩国完全看错了东

[1]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2] 「GSOMIA 破棄 安倍首相の発言全文」、『読売新聞』2019年8月23日。

[3] 事实上这与占领尖端产业优势与科技制高点,特别在当前形势下的宏观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4] 「GSOMIA 破棄 文在寅政権が極端な決定に走ったワケ」、2019年8月23日、https://www.iza.ne.jp/kiji/world/news/190823/wor19082320310027-n1.html?obtp_src=www.iza.ne.jp。(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北亚的安全形势。^[1] 这似乎是在描绘日韩关系对立的一幅新构图：过去的日韩矛盾主要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执，政治上双方一直在摸索妥协的着陆点，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日韩安全合作体制已经相对稳固，但目前日韩关系紧张导致军事合作机制这一基础亦出现裂痕，战略层面出现了不祥的迹象。

也许正因如此，2019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介绍区域国别安全合作的顺序时，将韩国从之前的第2位降格到了第4位，这一降级处理引发了韩国外交部的抗议。^[2] 1月15日，韩国公布《国防白皮书》，与之前版本相比，省略了“韩日分享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基本价值观”的提法，并将原来与韩国进行军事交流国家的顺序日中俄改为中日俄。^[3] 由于韩国一度中断和日本分享情报导致日韩之间缺乏情报交流，致使日本无法掌握朝鲜导弹的具体动向。据日媒报道，受制于地理条件及技术原因，日本在2019年5月以后多次未能探测到朝鲜发射的多枚新型导弹轨道。^[4]

这种局面对美日韩区域安全合作是一个打击，被认为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架构凝聚力也造成了连带损伤。^[5] GSOMIA曾被华盛顿吹捧为对美国在亚洲的辐辏同盟体系的重要软件更新：通过允许绕过美国“枢纽”并彼此直接共享军事情报，为日韩提供了一条直接途径，让两国分享有关朝鲜和该地区其他安全问题的情报，同时象征性地巩固了对中国的三边压力。^[6] 但近年来，当美国的两个盟友存在严重分歧并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时，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特朗普政府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意愿在帮助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发挥

[1] Kono Taro, “The Real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Is Trust,”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view/japan-south-korea-trade-spat-boils-down-to-trust>.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2] 「安保協力、韓国を四番目に降格 19年版防衛白書」、『朝日新聞』2019年9月28日。

[3] B. O. 基斯塔诺夫：“当代日韩关系困境与展望”，《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7期，第47页。

[4] 「北朝鮮新型ミサイル、探知できず」、共同通信社、2019年9月23日。

[5] Troy Stangarone, “Korea’s Dispute with Japan Spills into National Security,” August 27,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koreas-dispute-with-japan-spills-into-national-security/>.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6] Brian Kim, “GSOMIA and the Shadow of ‘Lee-Myung-Park-Geun-Hye’,” September 10,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gsomia-and-the-shadow-of-lee-myung-park-geun-hye/>. (上网时间：2020年8月15日)

影响力”，“华盛顿并没有积极寻求在盟友之间进行斡旋，而是基本上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并把这个领域留给了中国”。^[1]

日韩关系螺旋式下降且迟迟未能触底反弹，正因其共同盟友美国较之以往更多地处于“无作为”位置。正常情况下，美国会介入调停，强烈鼓励其两个重要的亚洲盟友在外交及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2]实际上，2015—2016年，面对因历史问题大闹分歧的日韩关系，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包括直接斡旋劝说在内的诸多措施来调和两国矛盾。当然，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一局面也并非毫无作为。例如，特朗普2019年7月曾透露，如果日韩双方都有意愿，或许美国会介入调停双方关系。特朗普还曾表示不希望韩国废止GSOMIA，也不希望日本将韩国从“白名单”中移除，但美国的声音似乎被忽略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7月31日在泰国曼谷与日韩外长会谈时表示准备解劝两国。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在国会亦曾表态称，为解决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美国将积极参与调停。然而，问题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调停意愿不足，美国的领导作用与同盟承诺也受到了日韩的怀疑。据报道，日韩外相对蓬佩奥敦促他们结束分歧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仅表明了这两个盟国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作用正在减弱”。^[3]意愿与能力均显不足的美国“霸权治世”及其同盟管理，使日韩的战略分歧与安全互疑有增无减、难以止跌。

日美韩共同的安全议程主要是围绕着共同的“朝鲜威胁”。然而，特朗普不反对韩国对朝鲜的和解政策，美韩也没有打算放弃绕过日本与朝鲜接触的外交策略，“重视盟友关系的奥巴马政府将韩日关系视为美国的战略要素，而特朗普政府则将韩美关系与美日关系割裂开来，分而视之”^[4]。这些因素

[1] Bonnie S. Glaser, “How an Alliance System Withers,”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9-09/how-alliance-system-withers>. (上网时间: 2020年8月15日)

[2]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3] Motoko Rich, Edward Wong and Choe Sang-Hun, “As Trade Conflict Worsens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U.S. Takes a Step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9.

[4]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仍在刺激或加深日韩的战略分歧与安全互疑，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当日韩越来越对维持良好关系失去耐心和信心，当观察人士倾向于认为日韩缓和紧张局势已前景暗淡时，热衷于“退群卸责”的特朗普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决心阻止其东亚的两个关键盟友之间的关系恶化和僵化，目前看仍是疑问。

四、结语

日韩关系时冷时热、经年曲折，从2018年秋季起，一路恶化至今，被认为坠入1965年建交以来的最坏状态。不过，日韩两国目前虽仍看似态度强硬，但也并非置双边关系彻底破局而不顾。实际上，日方已在对韩出口管制及经济制裁上留口子、开绿灯，韩方也投桃报李，在日韩GSOMIA于2019年11月到期后表示同意继续维持效用。然而，进入2020年后，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亟需日韩合作的背景下，双方之间仍旧爆发风波并严重损害到脆弱的关系改善进程。这是综合矛盾使然，而战略分歧这一结构性因素在其中具有关键影响。如果日韩希望为修复关系奠定基础，那么两国必须通过妥善处理各自基本安全政策、主要地缘战略、同盟体系协调等问题，包括理顺与朝鲜、中国乃至美国的复杂关系，来重新调整双边关系的战略参数并消除战略分歧。基于共同利益及形势压力，在双方努力及美国施压撮合下，在中日韩合作进程等积极因素推动下，日韩关系逐步走向一种战术性缓和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鉴于复杂的国际变局及地缘竞争，双方的战略分歧与互疑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有激化之可能，重建政治共识与互信可谓任重道远，这种基本态势决定了两国真正改善关系将面临曲折复杂的前景。

【完稿日期：2020-9-2】

【责任编辑：曹群】

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Difficulties in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WU Huaizhong

In recent years, Japan-ROK relations have been under constant tension, with historical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The role of deep normalization played by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has become gradually obvious. Specifically,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are generated and aggravated by the contradiction on structural elements, such as major security policie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lliance combination. As a new fundamental variable,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Japan-ROK relations from the deep structure: first, “DPRK factors” and the policy towards DPRK caused the basic security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eco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at odds over geostrategy on the rise of China; third, the alliance management under the “Trump shock” has led to the aggrav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ROK.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Japan and the ROK will gradually move towards tactical detente. However, to truly achieve structural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resolve strategic differences by adjusting their strategic parameters and rebuilding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bound to face twists and turns.

The Devolution and Way Out of UN Peacekeeping

HE Yin

The core mission of UN peacekeeping has evolved from maintaining peace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o maintaining peace and building peace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Since 2010, due to the changes in conflict forms, the influence of interventionism, the recklessnes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andate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major powers, the practice of UN peacekeeping has been devoluted from the “maintaining peace—building peace” model to the “building peace—keeping peace” model. The essence of the peacekeeping devolution is that the political approach was replaced by the security approach, which has dominated UN conflict management work. Reforms led by UN Secretary-General have not yet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peacekeeping devolu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sen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N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peacekeeping devolu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UN peacekeeping to the track of evolution.